

故漢人當時在新疆之農業已占有極重要之地位，而新疆本土之農業遂受漢人之影響，亦極發達，因此則與農業有密切關係之工藝品與貨幣亦必隨之發展，而爲漢人所自出，此在經濟學原理上已無可懷疑。由吾人考查之經過亦有可爲上述之左證者。余於十七年赴南路考查，在庫車沙漠中除拾五銖開元等制錢外，又拾方孔小錢甚多，卽辯機西域記中所述焉耆屈支貨幣所用之小銅錢是也。此類錢幣散布於沙漠中極爲寬廣，每與紅色或青色陶片相攙雜，俯拾卽是。又余在巴楚古墳中曾掘拾小銅錢一串，有繩縲爲之連貫，而此錢與西域語文字同在一墓穴中者。由上所述，則中國貨幣已通行於一般民衆，而爲農村社會中之重要交易品，而西域記中之金銀錢則反不多見。次若工藝品，在辯機西域記中曾述于闐國未曾有蠶桑，向東國求種子之事，又稱于闐工紡績繩紬，則于闐工藝之發達確受中土之賜，已無可諱言。除此外爲人民日常所用必需之物與農業關係最密切者，當以陶器爲最重要。余於民國十九年在雅爾崖溝西溝北古墳中所獲得之陶器，共八百餘件，卽本篇所述者，其溝西部分均有墓表作證明，確爲漢人遺留之事迹，在本篇中已有所闡述，但同時散布地表者亦復相似。又於庫車、巴楚、和闐之古瓦礫場，類此之陶片頗多，有時雜入西域之小銅錢或黑鐵錢，可證中國式之貨幣與陶器已普遍一般民衆，絕不能認爲此種陶器，祇限於漢人用而本地土人不用，因吾人尙未覓得與此類不同式樣之陶片，可證明爲本地土人所製或享